

浅谈西周社会意识形态的演变

李慧琳

(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 甘肃兰州 730070)

[摘要] 社会发展的变化必然会引起人的思想意识的变化,而思想意识的变化必然反映到文学作品中来,从而形成不同题材的作品,这些就会反映出一个社会的意识形态。本文试就西周初期、中期、后期三个阶段的社会现实中出现的颂诗、宴饮诗和怨刺诗三种不同内容的作品,研究西周社会主导思想的变化:由对神的崇拜逐渐转移到对人的主体作用的认识,即神性的褪去和人的作用的凸现。

[关键词] 颂诗;宴饮诗;怨刺诗;人的主体意识的凸现

对于祖先的称颂神灵的崇拜,是世界各族人民在人类幼年时代的一个普遍现象。当时的人们往往把自己取得的成就归功于自己祖先的佑护,上天的意志。从周初的颂诗处处高扬天命的的内容,我们就能看出这一点。

我们首先可以从《周颂·昊天有成命》说起。诗云:“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成王不敢康,夙夜基命密宥。”诗中说到成王“不敢康宁安逸”。这句话首先表现出成王对其先人的恭敬。第二则是表现了文王武王膺承天命的不可,所以成王才“不敢安居,使自己悠闲起来。”朱熹认为这首诗多道成王之德,疑成王之诗也。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诗中的“二后”和成王都是周人自己的祖先。这首诗也显示出在周人的意识中,自己的祖先应该受到尊敬,因为他们建立了丰功伟绩。但他们功业的建立,是由于接受了上天的意志。他们实质上在祭祀自己祖先的同时,更宣扬了“昊天”。也就体现了周人高扬天命的思想意识,他们认为自己祖先的神灵一定会保佑帮助自己的,同时他们也以自己英雄的业绩在人间实现了上天的意志。

周人的这种对祖先神灵的崇拜,把国家种族的命运都交给祖先的神灵和“上天”的这种思想在《闵予小子》中也有体现。诗中在警戒自己的同时也表达了对父亲、祖父的思慕。这种思慕在潜意识中表现出周成王希望得到祖先神灵的帮助,治理好自己的国家。这种现象说明周初先人把神灵,不管是祖先的神灵或是“上天”当成了自己的守护神,在他们的观念中更多的体现了神性。

周王朝的前中期国力强大、统治稳定。与其他周边各诸侯国相比处于绝对优势地位。在周人每次祭祀称颂祖先以后,都要宴饮与会的祭祀者。于是宴饮诗歌也就应运而生了。宴饮与会者,有的纯粹是为了表现奢华的生活,但有的是为了实现某种意图。《诗经》中的大部分宴饮都是属于后者的。同时宴饮的对象、地点以及形式都与周王朝的政治地位有着密切的联系。

最初的宴饮应当仅限于宗亲内部或周王朝统治集团内部。但后来却发展到周王朝和各个诸侯国之间。如《棠棣》就是兄弟之间宴会的诗。方玉润《诗经原始》说:良朋、妻孥未尝无助于己,然终不如兄弟之情深而相爱也。故认为此诗的中心乃是“凡今之人,莫若兄弟”。但是我们可以认为此诗是从本族与异族的对比中强调了同族的团结。在诗中诗人强调兄弟之谊的绝对性,实际上是想在对宗亲意识的警醒中,汲取抗拒危亡的精神资源。同时我们还可以看出:“不论是在周族发展壮大的过程中,还是在它获得政权,实行宗法统治的过程中,在很大程度上都是与异族的矛盾对立加深的过程,同时也是族群在外力作用下,内部向心力加强,血缘意识加深的过程。我认为它确实不仅仅表现的是兄弟之谊。

而《湛露》表现了周王宴请诸侯的情形。《彤弓》是周王赏赐有功诸侯后举行宴会时所唱的诗。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宴饮诗的产生与政治有密切的联系。主要是为了笼络统治集团内部成员,其目的是为了维护周王朝的统治地位。又如《蓼萧》所表现的是周人获得政权后,与所有人群确立政治关系。它用“宜兄宜弟”称道与会的诸侯。兄弟之谊终于从一族一姓的狭隘界限中突决出来,变成了联结人群的观念纽带。^[1]在《鹿鸣》之中已经出现了颂扬嘉宾德行的倾向。如“我有嘉宾,德音孔昭。”而最后一句“以燕乐嘉宾之心”

却是本诗的中心。这说明周王朝地位已经有所衰落,需要得到各诸侯的支持与拥护,其最终目的是为了收拾人心,维护周王朝。

由以上我们可以看出宴饮诗的产生与周王朝的统治地位有密切的联系,宴饮的对象也从周王朝的宗族内部扩展到统治集团内部,再后发展到周王朝和其他诸侯之间。这不仅仅是周王朝的统治者为了向世人展示恩惠,而是隐藏着深层的社会危机。同时也是统治者认识到要维护周朝的统治。必须取得统治集团的支持,包括其他的诸侯国。他们从对神灵的崇拜转向了对人的笼络,虽然他们的目标仅仅局限于整个统治集团的内部,但较之以前对神灵和上天的崇拜已是巨大的进步。从此,在肃穆的庙堂里,笼罩的不再是单纯的宗教气氛,也有了浓重的政治气息。参与顶礼膜拜的人,不仅仅是周族成员,而且有了众多的异姓诸侯。^[2]

在西周东周交替之际:周道始缺,怨刺之诗起,周室大坏;《十月之交》《民劳》《板》《荡》勃然俱作(郑玄《诗谱序》)。[3]面对这样的现实,统治阶级中的忠贞之臣、明智之士,对社会的黑暗和朝廷的衰败感到痛心疾首。同时他们大多是政治上的落魄者和失败者。他们不满意自己受到不公平的待遇,于是就针砭时弊,痛斥昏君和佞臣。这时他们的创作已经不是先前的群体歌唱和歌唱群体,而是众多个体之我的抒愤或歌哭。他们的悲哀也往往从自己的怨恨开始,但没有停留于此。个人的不幸引发为对时政的干预,个人的悲怨上升为对国家的拯救的思想,这在一定程度上出现了个体意识。如《十月之交》:“四国无政,不用其良。”《民劳》曰:“无纵诡随,以谨无良。”《荡》:“曾是强御,曾是掇克,曾是在位,曾是在服。”在这里作者严厉地痛斥了那些欺上瞒下,祸国殃民的统治阶级内部的爪牙,把批判的矛头转向了中层统治阶级。

随着社会矛盾的加深加剧以至崩溃,诗人们的忧患也随之深化。他们在批判统治阶级的同时也把目光转入下层人民。这又是一个大的变化。如《十月之交》:“今此下民,亦孔之哀。”《大雅·民劳》:“民亦劳止,汙可小康。”《大雅·板》:“上帝板板,下民卒瘁。”“天之牖民。”《大雅·荡》:“荡荡上帝,下民之辟。”这些诗中屡次提到“下民”。根据程俊英先生的解释,他认为就是“天空下的人民”。^[3]由此可以看出这个“天空下的人民”应指为“下层劳动人民”。在这些以没落贵族为主的诗人们开始关注下层人民的重要性。他们认识到国家的稳定、统治的延续,除了以国君为首的统治阶级,还有起更重要作用的人民。当黑暗的政治危及到人民的生命,使他们无法生存的时候,他们就会推翻王朝。也暗示出统治阶级应该尊重下层人民,只有使他们安居乐业,才能取得国家的长治久安。这种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中国延续数千年的民本思想。虽然它还处于萌芽状态,但说明那时他们已开始注意到下层人民的重要性,把他们提到了“人”的地位上来,同时也可以说从那时起“人民作为历史的创造者和推动者”的思想已经诞生了。

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在整个漫长的周王朝,我们的祖先把自己的希望由最初的寄于上天和神灵转变到社会的上层阶级,最后又转向下层人民的思想意识形态的演变过程。表明随着社会的发展变化,在先民的思想意识中神性的减退和人的主体地位的凸现,同时也体现了整个人类思想意识形态的演变过程。

参考文献:

- [1] 李山. 诗经的文化精神[M]. 东方出版社, 1997.
- [2] 郭杰. 从《生民》到《离骚》[J]. 文学遗产, 2001.
- [3] 程俊英. 诗经注析[M]. 中华书局, 2006.

作者简介: 李慧琳(1983-), 男, 2004年毕业于商丘师范学院中文系, 获学士学位, 现为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生。

收稿日期: 2007-11-23